

论徽商文化的形成、特点与现实意义

江灶发¹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2)

【摘要】: 明清商界称雄三百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极富特色的徽商文化, 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阐释其形成、特点与现实意义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徽商文化的形成与徽州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徽商文化以“贾而好儒”的本质特色, 敬业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诚信守信、以义取利的贾道以及形成“新四民观”的创新理念为其特点。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 弘扬徽商文化的精髓, 无疑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关键词】: 徽商文化; 贾而学儒; “徽骆驼”精神; 诚实守信; 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72(2017)06—0111—07

DOI:10.13676/j.cnki.cn36-1224/f.2017.06.011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徽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徽商文化, 在古代中国十大商业文化中独占鳌头, 秉承“读书穷理”“诚信取义”“耐劳勤俭”理念以及开拓创新精神, 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极具当代价值。目前, 国内关于徽商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徽商文化的解读, 包括徽商文化的理念、产生、特色等, 如李珍(2009)认为徽商文化将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于一体, 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1]著名徽学专家叶显恩(2016)对徽商文化的基石、特色、精神以及局限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2]二是关于商帮文化的比较研究, 如陈立旭(2005)基于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进行了比较分析,^[3]梁德阔(2011)研究了儒家伦理和徽商精神——“韦伯式问题”的实证研究;^[4]三是关于徽商文化的传承及应用研究, 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兴, 各领域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徽商文化的传承与价值研究(宋艳和陆洪艳, 2015)。^[5]

综上所述, 徽商文化研究成果颇丰, 但无论是对徽商文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其应用研究仍然相对滞后, 对徽商文化的成因、特点的地域特色以及文化底蕴较少研究; 成果多系徽州文化研究或徽商研究衍生而来, 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自有其特定的“土壤”。本文从徽州地域特色和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入手, 阐述徽商文化的历史形成、主要特点与现实意义。

二、徽州独特的地域环境是徽商文化形成的根源

收稿日期: 2017-08-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方依恋视角下的国内游客亲环境行为特征、驱动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416610034);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婺源县江湾镇江湾村历史与文化研究”(16CS15)

作者简介: 江灶发,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地域文化与乡村景观研究, 联系方式 jiangzff123@126.com。

不是任何一个地域都能产生堪称商帮的文化。徽商文化的形成与徽州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清的徽州，“儒风独茂”“文风昌盛”“宗法严密”“以贾代耕”“富接江南”。徽州特定地域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良性循环，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徽商文化。

（一）“以贾代耕”，促进了徽商文化的萌芽

古徽州一府六县（包括歙县、黟县、绩溪、婺源、祁门、休宁），位于皖南山地丘陵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婺居徽饶间，山多田少，西南稍旷衍，东北多依山麓垦以为田，层累而上至十余级不盈一亩；牛犊不得耨其间，刀耕火种；溪涧之润多不及受，而仰泽于天”（葛韵芬和江峰青，1996年版）。^[6]这种具象在徽州各县大同小异，“则事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东晋以后，中原世家大族纷纷避乱南迁，更加剧了徽州的人地矛盾，也注定了徽民外出经商谋生的命运。明嘉靖、万历以后，因“徽民寄命于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以贾代耕”，促进了徽商文化的萌芽，也为日后的“无徽不成镇”奠定了基础。

（二）徽州独特的人文环境铸就了徽商文化的特质

随着北方世家士族几次大规模南迁徽州，加强了徽民的宗族观念和“好儒”之风。新安（徽州）乃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阙里，自宋以来，集儒学之大成者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不仅“操纵中国哲学、教育、礼制等凡七百年”，而且“支配日（本）、朝（鲜）之文化亦数百载”（高令印，1987）。^[7]尤其在明、清两代，更是被封建朝廷奉为儒学圭臬。徽人对朱熹顶礼膜拜，朱子的理学和封建宗法思想对这里的影响极其深远，“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耕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何应松，1990）^[8]。在朱熹及其后世学一代复一代的影响下，徽州成为“东南邹鲁”和“儒风独茂”之地。朱子的思想和言论，便成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即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吴翟，2006年版）^[9]。

徽州的宗族制度最为严密，其势力也最为强大。朱子“三纲五常为大体”的“家礼”被各族的“缙绅之士”“嫁接”到“族规”中，从而维护与加强了宗族统治。徽商仰慕儒风，不惜捐金助银，为本族修宗祠、立族规、续宗谱、置族田等“义举”，共同维护了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宗族制度。清人赵吉士对其描写道：“徽州聚族而居，绝无杂姓人搀入，风俗最为古朴。千人之村一姓家族世代聚居，祭用朱子‘家礼’，彬彬有度，少长有序。千年之墓，不动一土；千年之族，从未分离；千载族谱，丝毫不乱。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赵吉士，2008年版）。^[10]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对徽商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可以说，徽商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的孕育下形成的，具有儒家文化“诚信、仁义、勤俭”的文化特质和独特的文化底蕴。

（三）徽商的“酵母”作用推动了徽商文化的发展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从徽商的发展史来看，徽商萌芽于东晋，到明代初期，徽人经商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这一时期是有商无帮，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帮。至南宋，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徽商得到长足发展。明清是徽商的兴盛时期，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有“无徽不成镇”之誉。清代中晚期逐渐衰落。生长于徽州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徽商，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加之徽州又是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故里，徽商对他有极强的乡土认同感，这便造就了徽商“以儒术饬贾事……实贾服而儒行”，贾而好儒，贾儒结合。也正是由于徽商的“崇文好儒”，以及大量行走天下、博采众长的徽商与仕宦的归里，使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在徽州这块钟灵毓秀之地得到完美的结合，形成极富特色的徽商文化，而又不不断向外灿烂地延伸，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三、徽商文化的主要特点

（一）“贾而好儒、贾儒结合”是徽商文化的本质特色

徽商的本质特色是“好儒”。对于“贾而好儒、贾儒结合”的徽商而言，“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不言而喻的。明清徽商在“儒风独茂”和“科举仕宦”蔚然成风的双重深刻影响下，自然无法摆脱“官本位”价值观念的羁绊，以儒为本，以贾为用，科举仕宦，光宗耀祖必然是其终极追求。而且，这种阶级的利益植根于徽商的内心深处是挥之不去的。徽商之中“先贾后儒”“先儒后贾”或“亦儒亦贾”者，俯拾即是。根据叶显恩先生对张海鹏等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的粗略统计，贾而好儒（包含商而兼儒、弃商归儒、贾服儒行、以儒服事贾、迹贾而心儒等）有 36 例，先儒后贾者有 143 例（叶显恩，2016）。^[2]歙人汪道昆云：“新安三贾一儒……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为子孙计，业儒而服贾，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锤则千驯，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王世华，2004）！^[11]也有的则通过科举而成官宦。歙县程晋芳，业盐于淮，兼治儒术，“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终于举乾隆朝“辛卯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叶显恩，2016）。^[2]

很显然，这并不足以说明徽商“好儒”之全部。他们更清楚，金字塔式层级管理的用人制度下，徽商之中真正通过科举入仕者，屈指可数。因此，“读书穷理”和为子孙计，才真正是徽商“贾而好儒”的本质所在，也是徽商“好儒”外化的重要表达方式。通过“读书穷理”，从书海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为在商海中游刃有余；而一旦经商致富，不惜斥巨资回流资助和兴办家乡文教事业，绝大多数徽商把“振兴文教”作为他们毕生的执着追求。据道光《徽州府志》的材料统计，乾隆、嘉庆几十年间，在扬州的歙县徽商为修复家乡的两个书院（三间和古紫阳书院）共捐银 7 万余两，其中两淮总商鲍肯园一人两次捐银达 1.1 万两（李琳琦和王世华，1997）。^[12]婺源的紫阳书院在嘉庆年间的复兴过程中，婺源绅商极其踊跃，一次便合力捐银共 3 万多两，其中独捐千金者 18 人，而且这 18 人中绝大部分是婺源商人（李琳琦和王世华，1997）。^[12]皖南的徽州社会风气历来崇文重教，百姓尊奉“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宋代以降，徽州更是文教昌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院私塾遍布乡野。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徽州府有书院 89 所（李琳琦，2003）。^[13]一府之地，如此多的社学书院，在全国也实属罕见。而徽州书院之盛，又主要是徽商慷慨资助的结果。徽州文教事业长盛不衰，硕果累累。据朱彭寿《旧典备征》统计，在清代顺治（1644）至光绪（1908）年间，安徽省状元人数共有 9 人，居全国第三位，而弹丸之地的徽州一府（当时安徽全省共有八府）就达 4 人，他们分别是歙县的金榜（1772）、休宁的吴锡龄（1775）、休宁的黄轩（1778）和歙县的洪莹（1809）（张海鹏和唐力行，1984）。^[14]毋庸置疑，徽商的“酵母”作用促进了徽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徽商“好儒”，固然有附庸风雅的成分，也易于与封建政治势力相结合，但主要是“读书穷理”使然。徽州由于“儒风独茂”，因而生长于儒家“土壤”的徽商自幼受到儒学的熏陶，而且奋迹江湖的徽商仍好学不倦，注重提高文化素养。歙县盐商吴炳奇寓扬州时，“经常白天谋划盐务之策，夜间学习汇编”。休宁汪志德“虽身陷商贾，却潜心于读书穷理，从无间歇”。对于这样具备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自然在商海洪流中，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舍；运以心计，精于筹划。甚至“所求无不遂，所欲无不得”（李琳琦和王世华，1997）。^[12]“多才善贾”，历来如此，这正是徽商异于其它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并成为中国古代众多商贾中一支劲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文化的支柱

迫于生计，很多徽民不得从小背井离乡。异地的陌生、商途的艰险，商海的沉浮，经受从肉体到精神的残酷折磨，铸就了徽商坚忍不拔、拼搏进取、勤勉俭朴、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徽商对商业的执着与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极为罕见。不少徽商外出经商后，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往往与家人一别数载至十几载，有的甚至一生“独在异乡为异客”。他们不仅对自身主持的商务苦心经营，而且对于代他人主持的商务亦尽心尽力。如清代婺源人詹谷在崇明岛替本县江湾江某主持商务，时值江某年迈返乡，詹谷克难排险，尽心经营。其后江某之子来到崇明岛继承父业，詹谷将历年收支账簿尽数交还。这种敬业精神对于徽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洪永平和裴德海，2014）。^[15]婺源江湾江导岷，幼年丧父，承族人教养，后得遇张謇，成为张謇的入室弟子。1901 年，江导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江南陆军师范学堂测绘专业。同年，适张謇经营通海垦牧需要，亟招江导岷协助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江苏南通）。茫茫荒滩盐垦异常艰辛，常人难以想象，“非风潮雨急，即除夕、元旦曾无负手嬉游之暇。”

面滩十余载终将 12 万亩荒滩全部开垦成功，年产棉花 3.6 万担。江导岷坚忍不拔、拼搏进取、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深得张謇的特殊信任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张謇曾致函江导岷称“仆为世界公益至弃家不顾，舍儿不顾，亦与释迦之割肉喂鸟兽无异”（张謇研究中心和南通市图书馆，1994）。^[16]苦尽甘来，1915 年，公司将开垦好的部分田产分给股东，江导岷作为公司重要创始人，获张謇赠送 60 股红股，在三堤分得 1400 亩“红田”，他又自购 600 亩，共有田产 2000 亩，号称“导耕仓”，（冯剑辉，2008）^[17]200 成为江湾萧江氏首个大富商。

徽商一般以小本起家，靠的正是勤俭持业、勤俭持家的勤俭观。勤与俭在徽州各地蔚然成风。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说：“新安（徽州）勤俭甲天下，富亦甲天下。”商贾创业含辛茹苦，求取功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上文提到乾隆年间两位休宁籍状元黄轩和吴锡龄均出身贫寒。黄轩常常在自家的阁楼里苦读，直至深夜才架梯下楼；吴锡龄往往在野外用功，饿了吃野菜，渴了喝渠水。黄吴的勤勉苦读终将换回科举的魁首（叶显恩，2012）。^[18]据笔者查阅徽州古籍文献发现，徽商、仕宦之中有不少是“初年运限”，“由困而亨”的。在徽州，“徽骆驼”精神世代传承，持久弥弘，不知成就了多少徽州名商大贾和科举仕宦，“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文化的支柱。

（三）诚实守信、以义取利是徽商文化的基石

徽州素称“文献之邦”“礼让之国”，儒家的思想道德在徽民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徽商打小深受儒家“诚实守信、仁义智和”伦理思想的影响，并内化为一种行为准则，规范自己、启迪他人，并在长期的经商创业中恪守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形成了“诚信不欺”的商道。明清徽商之所以称雄中国商界三百余年，讲的就是“诚”“信”“义”。

1. 以诚待人。徽商所谓的“诚”，便是儒家所崇奉的“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的道德说教，并将其具体应用于商贾之中。歙商鲍雯，自幼习儒，后业盐于两浙，他“虽混迹厘市，一以书生之道行之，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人亦不君欺，久之渐致盈余”。歙商许宪，

在总结经商之道时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他把“诚”付诸实际行动中，故“其经商也，湖海仰德，”“出入江淮间，而资益积”。道光年间，黟商胡荣命贾于江西吴城五十余年，童叟不欺，名声大振，晚年告老归里，有人“以重金赁其肆名”，被胡拒绝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也？欲藉吾名，彼先不实，终必累吾名也”（张海鹏和唐力行，1984）^[14]。诚实是经商成败的关键，如若待人不诚，即使借别人的“金”字招牌也是无益的。

2. 取信于人。人无信不立。江导岷 1922 年返里，决定独资重建江湾萧江宗祠——永思堂。尽管其复兴此祠有多种原因，但践儿时之诺是其中最重要的。张謇在《重修宗祠记》中这样写道：“导岷吾弟子，其兴复此祠也，若有前兆，自言八龄时甲戌元旦，随嫡母王太夫人循俗登览荒祠遗址，左顾右盼，时族众咸集，叔祖赞禹戏摩其顶曰：‘汝将来能兴此祠乎？’遽应之曰：‘诺’。太夫人归述于封翁有潮，封翁复戏调之曰：‘汝将来真能兴此祠乎？’则又应之曰：‘能’，时恣为笑乐而已”（冯剑辉，2008）。^[17]202 永思堂重建，完成其主体工程耗资竟达 6 万银元，工程建成历时近 20 年，总投资超过 20 万银元。江导岷一句儿时戏言，一诺千金，不惜耗费一生心血，绳此巨武。休商程伟贸易于江浙一带，由于他“信义远孚”，故“富商大贾之资本成欲委托于公。自是公之财日益丰，公之名亦益著”（张海鹏和唐力行，1984）。^[14]徽商恪守的“信”，自然也是从儒家所谓“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信修睦”中来的。

3. 以义为利。徽州商人大多标榜重义轻利、不义之财不可取。清代歙人凌晋，便是徽商中“以义取利”的一个典型。贸易中，“黠贩蒙混以多取之，不屑屑较也；若讹于少与，觉则必如其数以偿焉。然生计于是乎益增”（张海鹏和唐力行，1984）^[14]。清道光年间，黟商舒遵刚对义、利关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在他看来，“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叶显恩，2016）^[2]。舒遵刚的这种“义利观”，在徽商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四）拼搏进取、开拓创新是徽商文化的核心

叶显恩（2006）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徽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他们既传承了儒家的道统，又作了大的解构，为传统激活了生命力。”^[19]开拓创新是徽商文化的核心。

1. 突破了地域限制，走出去，变危机为转机。明清时代，就在全国多数山区农村仍然保持闭锁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时，徽商却“以贾代耕”，足遍半个宇内了。这不仅需要勇气、智慧，更要有创新意识。为了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做强做大，一方面，徽商充分借助本地域强烈的宗族观念，在商业组织上，构建起以血缘为核心，以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互利互助的商业网络，形成稳固的商帮；另一方面，徽商将徽商文化“贾而好儒”的特色运用到极致并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一支高文化素质的商帮群体，并在商贾活动中将儒家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儒家的思想道德伦理规范自己，影响他人，获得商界的赞誉和信赖。同时，不断引进、吸收异地文化之精华，从而使自身文化充满活力，蓬勃发展。徽商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和全国性市场形成的开拓者、排头兵，无疑是璀璨的徽商文化所铸成。

2. 冲破了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桎梏，形成以“新四民观”^②为核心的徽商文化。重农抑商，一直是我国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于这一封建政策，仍然固守不变。“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食在于禁华靡”。然而针对“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明代歙人汪道昆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说：“窃闻先王重农抑商，因此，薄农税而重征商，余以为如此不妥，商、农本同等重要，应平等对待，交相重矣。耕者什一，文王不以农故而毕蠲；乃若讥而不征，曾不失为单厚。及夫垄断作俑，则以其贱丈夫也者而征之。然而关市之征，不踰什一，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栾成显，2014）？^[20]汪道昆的这种商、农“交相重”的思想，道出了徽商的心声，是为维护商贾利益而发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

四、徽商文化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徽商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丰富和发展有着地域特色和广大群众基础的徽商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徽商文化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价值。

（一）“贾而好儒”的人文情怀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贾而好儒”的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一是“读书穷理”。徽商历来“多才善贾”，积极从书海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用知识搏击“商海”。徽商正是由于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才使其在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二是“崇文重教”。致富后的徽商不惜斥巨资“振兴文教”，兴办社学、书院，重视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实现“儒商”良性循环。徽州崇文重教已成习俗，以至人才辈出，代挺闻人。三是“以义取利”。贾为厚利无可厚非，而徽商则注重商业活动中的儒道，以程朱理学“以义为利”的“价值观”“义利观”为指导来处理义、利关系。

而且多数徽商经商致富后，不忘回报社会，他们积极投资建设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这种回馈社会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徽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习近平总书记（2015）指出，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21]知识改变命运。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宋凌云和王嘉毅，2017）。^[22]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凸显。因此，深入研究区域

^②①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到明中叶，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以及“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观点。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观”。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敬业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最是吃苦耐劳、勤恳努力，有着敬业、执着、拼搏、坚韧、进取等优秀品质。徽商的巨大成功与敬业拼搏、坚忍不拔的“徽骆驼”精神密不可分，也正是由于徽商心存“一贾不利再贾”的敬业进取之心，才创造出数百年不衰的商业奇迹，并在商贾洪流中养成了对人对事诚信、友善的处世原则。著名徽州籍学者胡适不仅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而且以身作则一生努力做“徽骆驼”。“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徽骆驼”精神就要弘扬徽商敬业、自强、自重，不断自我超越、积极进取的精神。

（三）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

诚信，顾名思义就是诚实守信，言行一致，一诺千金。明清徽商称雄中国商界三百余年，讲的就是“诚信”二字。徽商深受儒家信义伦理思想的熏陶，坚持重信崇义的商业伦理准则，诚信为本、义中取利，在长期的经商创业过程中恪守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形成了“诚信不欺”的商道。诚信是徽商文化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诚信显得尤为珍贵。当今社会某些人诚信缺失、利欲熏心、道德沦丧、甚至丧尽天良。我国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问题已成为一大社会隐患，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存”。弘扬诚信初心，筑牢社会诚信体系基石，是政府取信于民的基础，企业发展的生命和个人立身的根本。

（四）“新四民观”的创新精神

开拓创新是徽商文化的核心。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就不会有持续辉煌达数百年的徽商文化。明清徽商为振兴商业发展需要，提出诸多新儒贾观，形成了商何负于农的“新四民观”，充分肯定了商贾的职业价值，大大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中国封建统治社会长期以来“重本抑末”政策的否定，是对传统“士农工商”观念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今天，我们弘扬徽商文化，就是要弘扬不因循守旧，富有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

五、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兴于文化，可以说，璀璨的徽商文化是铸就徽商辉煌的力量源泉。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人民大众的理论需求与价值期待，在当下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凸显的时代，就是要推动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弘扬和发展包括徽商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既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党在总结各个时期文化发展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得出的一贯主张。

参考文献：

[1]李珍.论徽商文化理念的多元归一性[J].学术探索,2009,(6):118-122.

[2]叶显恩.论徽商文化[J].江淮论坛,2016,(1):5-11.

[3]陈立旭.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5,(3):3-12.

-
- [4]梁德阔.“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以徽商为例[J].江汉论坛,2011,(10):59-64.
- [5]宋艳,陆洪艳.传统徽商文化研究综述[J].合作绿洲与科技,2015,(7):16-17.
- [6]葛韵芬,江峰青.民国婺源县志(一)(刻本影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113.
- [7]高令印.朱熹事迹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
- [8]何应松.道光休宁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42.
- [9](清)吴翟.茗洲吴氏家典[M].刘梦芙,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3.
- [10](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下册)[M].周晓光,刘道胜,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8:261.
- [11]王世华.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J].安徽史学,2004,(1):96-102.
- [12]李琳琦,王世华.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3):80-88.
- [13]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48.
- [14]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J].中国史研究,1984,(4):57-70.
- [15]洪永平,裴德海.弘扬徽商精神与培育核心价值观[N].光明日报,2014-12-18(07).
- [1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卷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53.
- [17]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 [18]叶显恩.徽州人才杰出繁盛探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5):548-554.
- [19]叶显恩.徽商的辉煌业绩源自高文化素质与创新精神[J].黄山学院学报,2006,(6):7-9.
- [20]栾成显.徽州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历程[J].安徽史学,2014,(2):109-113.
- [21]习近平.习近平致信祝贺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开幕[N].人民日报,2015-05-24.
- [22]宋凌云,王嘉毅.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J].教育研究,2017,(2):4-11.